

国视为殖民地。1948年底李宗仁代理总统，张治中去北平进行国共和谈，当时我很希望和谈能成功。1949年初国民党政府机关和官员开始纷纷撤离南京，我想如果跟他

们走，那是自讨苦吃，没有前途；共产党来，总还是要进行建设，要办大学，要教授教书的，所以我决定不离开南京，等待解放。

一个中国热血青年的必然选择

○储传亨（1946—1949，土木）

储传亨（1928.11—2015.9），江苏省宜兴市人。1947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8年5月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北京市委学委、市委宣传部和市委办公厅干事、市委研究室副主任、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副局长、市建委副主任、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建设部总规划师等职务。1999年12月离休。

1946年10月，我和考取清华大学的几个宜兴同乡，一起从上海乘江泰轮穿越渤海，经过三天三夜风浪颠簸，到达塘沽，然后由领港船引导由海河到达天津，再乘火车到北平，先住在国会街北大四院，在那里休息了三天，然后乘火车到达清华园车站，已有在校学生迎接我们进清华园。

一、进入清华，就强烈地感觉到民主、自由的风气。我印象最深的有几件事

一是学生自治会是经过竞选、民主选举的。连伙委会都是经过竞选、民主选举的。

二是民主墙上不断有各种社团贴出海



储传亨学长

报，分析形势，亮明观点，自由发表意见，不同意见还可以争论，这是在中学里从来没有的。

三是在清华礼堂和同方部以及临近的燕京大学经常有教授做报告，阐述自己的政治见解，供同学们分析参考。

在这种民主自由的环境下，包括自己在内的许多大一新同学，逐步改变中学时只埋头学业的习惯，关心国内时事政治，加上剧艺社、大家唱等进步社团演出许多揭露国民党反动腐败的话剧、歌咏，使得许多同学关心国家大事，要求改变现状，



清华自治会理事普选选票登记（张祖道摄于1948年9月）

革命形势一浪高过一浪。

二、参加第一次革命斗争——反对美军强暴北大同学沈崇的抗暴斗争

1946年圣诞节前夜，北大女学生沈崇遭美军强暴，民主墙上就贴出了几个社团的海报：揭露国民党当局封锁消息，称此事是纯法律问题等，企图大事化小，不了了之；揭露北大抗暴筹委会遭国民党特务分子打砸。清华学生自治会召开紧急会议，发动同学签名支持罢课、游行。我立即签了名，在大礼堂动员会上，听到了揭露美帝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罪行和上海等多地美军的暴行：从日本投降后到1946年11月，南京、北平、上海、天津、青岛五市，美军暴行3800多起，中国人死伤3300人以上，沈崇事件仅是其中一例，使我从思想上认识到要从单纯的正义感上升到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斗争之中。

30日早晨8时，明斋前大操场集合了1000多人的队伍，学生自治会常驻地主席严令武讲话说：“清华大学在五四运动以后的历次学生运动中，都有着光辉的战绩。

从清华园到城里这条路，五四时代，清华同学走过；“一二·九”时代，清华同学走过；今天，我们要再走一次！”我们冒着寒风，先和燕大的队伍会合，向城内进发。进德胜门后，转向定阜大街，在辅仁大学门前高呼：“欢迎辅仁同学参加抗暴游行。”因为辅仁是教会和国民党统治严密的学校，不许出壁报，更没有学生自治会，但是正义之火在他们心中燃烧。在清华、燕京同学的召唤下，200多男女同学冲了出来，带着校旗，汇进了清华、燕京游行队伍，到北大红楼广场，和北大、中法、师院等大学的队伍会合，然后沿皇城根、东华门、王府井，向军调部所在的东单三条进军，一路上高喊：“抗议美军暴行！”“美军立即撤出中国！”“民主新中国万岁！”等口号，散发《告全国同胞书》《美军暴行真相》等传单，受到沿街市民的热烈欢迎。到军调部见大门紧锁，同学们用英语高呼口号，并把标语贴在门上、围墙上，然后集合在东单广场，举行控诉美军暴行大会，会后继续游行，并派代表去北平行辕向李



北平学生“抗议美军暴行大游行”来到军调部（即协和医院）门前，高呼口号（张祖道摄于1946年12月30日）

□ 回忆录

宗仁请愿。下午5时游行结束，各校同学高唱《团结就是力量》分头返校，清华、燕京队伍徒步走向清华园和燕园。这一天是我发自内心自觉参加的斗争，认为是一个中国热血青年的必然选择。

三、从参加“读书会”到加入“民主青年同盟”，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

参加了抗暴游行后，激动的心情难以平复，这时第一学期已经结束，进入寒假。同室的查汝强对我说，你单靠看进步的文艺小说不够，应该看一些进步的理论书籍。我同意，于是他介绍我参加一个读书会，记得有经济系孙仲鸣，历史系西学勤，还有一些历史系、社会系的同学，他们借给我看《大众哲学》《社会发展简史》等进步书籍，还有一些包着外皮写着文艺小说名字的《共产党宣言》《新民主主义论》等比较敏感的书籍，并且每周召开一两次讨论会，使我对国家当前的形势，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应该为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做什么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1947年2月的一个晚上，查汝强对我说，你参加了读书会，思想上有很大进步，但是要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必须要有革命组织坚强的领导，你是否愿意参加革命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我知道查汝强过去参加过新四军，一定和共产党有关系，“民主青年同盟”也一定和共产党有关系，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参加。他给我一个联络口号，说不久有人会用这个口号和我联系。果然，不几天物理系的何祚庥找我，对上口号，他表示和我单线联系，并讲了一些组织纪律，以及团结进步同学、影响中间同学的任务。从此，我

感到我不是为个人的前途找出路，而是为国家的前途进行革命工作，一切服从于革命工作的需要。

四、粉碎国民党特务、“三青团”发动“反苏大游行”的阴谋

国民党、“三青团”不甘心抗暴斗争的胜利，伺机报复，在1947年2月间，利用苏军在东北拆走机器、强暴妇女等事件，发动反苏反共大游行。这件事苏军是有错误，但国民党的目的是打击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同学。清华的“三青团”以壁报发动签名，号召同学参加第二天的全市反苏反共大游行。地下党要求在同学中揭露他们的阴谋，我也接受了任务，到宿舍访问同学，做工作，劝说同学们要了解这件事的复杂背景，不要上当。第二天早上，“三青团”包了几辆校车开到明斋前，动员同学上车进城参加游行。有一些同学从宿舍出来了，打算坐车，这时，学生自治会的同学发表演讲说：同学们要擦亮眼睛，上次抗暴游行，我们是沿着五四、“一二·九”运动的足迹，徒步进城，现在国民党、“三青团”让你们坐车进城游行，你们不要上当，玷污清华的名声。原本准备上车的同学回宿舍了，只有国民党、“三青团”分子坐车开走，而车上已被进步同学贴上“党棍子大游行”的标语，走到西单，被反苏游行的队伍把车砸了，演出了一场“狗咬狗”的话剧。这次活动，让中间同学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的反动面目。

五、在民青组织的领导下，自己逐步成为自觉的革命者

在民青组织的领导下，我不仅积极参

加历次罢课、游行等革命活动，而且逐步成为这些活动的骨干，如担任纠察队员，游行时防止国民党特务、警察冲击队伍，保护游行队伍；罢课时，巡视校园，防止特务、军警偷袭，等等。如“五二〇”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当队伍沿长安街到西单拐弯时，突然冲来一批中国大学的反动学生和特务，企图冲散游行队伍，我们的纠察队员立即组织几层人墙，堵住他们的冲击。1947年这一年，学生运动不断。暑假期间，开展助学运动，我们走街串巷，在餐厅、商店，为没有公费的中学生募捐，宣传国民党政府打内战、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同时劝购助学券，支持中学进步力量的发展，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

与此同时，看到不少同学在清华园民主堡垒的熏陶下，在参加学生运动中，思想迅速进步，便利用同乡同学的关系，进行个别工作，发展他们参加民青组织，如同乡刘惠群、王庸勤、徐亦良，同学潘永奎、庄沂等，并和潘永奎等一起，做发动工友的工作，开办工友夜校，既学文化，更宣传革命形势，从中培养积极分子，以至发展为共产党员。

六、参加中国共产党，为革命奋斗一生

1948年4月，查汝强找我，问我是否愿意参加共产党，我说我从参加民青起，就想到总有一天要参加共产党。他布置我写自传，自传交给他几天后，他通知我说，组织上已批准我入党，并告诉我一个口号，说有人会找我。不久张天泰来找我，并决定选择五月一日宣誓。那天晚上，我们翻过清华园西边残破的围墙，到圆明园里，

庄严地进行入党宣誓，我记得誓词（大意）：为了新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富强，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了共产主义在中国、在全世界范围的实现，我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胜利的时候不骄傲，失败的时候不气馁，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组织，执行党的决定，直至抛弃头颅，流尽最后一滴血，此誓。

从此，我感到我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党和人民了，要更加努力干革命工作，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1947年7月开始，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作为第二条战线的学生运动，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在全国各大城市产生了很大影响。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大肆镇压逮捕进步学生，为此，清华决定罢课三天，成立“人权保障委员会”，营救被捕同学。11月1日，清华、北大、南开三校举行西南联大校庆晚会时，突然传来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在狱中惨遭杀害的噩耗，清华及各校决定再度罢课，并组织二百多人进城宣传、募捐。6日在北大民主广场召开“追悼大会”，开展反迫害运动，这一斗争迅速获得全国其他大城市高校的响应。从1948年2月到4月，华北多所高校举行反迫害的集会、罢课活动，4月，清华、北大等校举行总罢课三天，并在北大民主广场举行誓死保卫学联、反迫害营火大会，点燃了“四月风暴”。接着6月，发动了“反美扶日”大游行。7月，北平发生了“剿总”对东北流亡学生请愿活动进行血腥镇压的“七五血案”，城内各大学开展“反剿民，要活命”集会，并到中南海北平行辕请愿，清华、燕京队伍原计划进城参加，被堵在西直门外，并被

□ 回忆录

一批暴徒包围打伤，经过反击，同学们才冲出包围，返回学校。我和艾知生当时都在队伍里，主动当纠察队，保护受伤同学尽快脱离包围，和同学们一路唱着《团结就是力量》返校。

在学生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的形势下，许多原先处于中间状态的学生，思想迅速进步，“民青”“新青”“民联”（北系）的组织迅速扩大，吸收许多新同志参加。我的组织关系也从工友夜校转到“民青”执委会，负责联系两个分部（支部），一个是艾知生（工学院），一个是吴时生（政法学院）。8月，国民党开列黑名单，对各校进步学生进行大逮捕。地下党事前得到消息，将名单中的学生撤走去解放区或躲避在进步老师家中。组织上决定根据形势需要，不再进行大规模的校外斗争，而将重点放在校内团结同学、迎接解放上。党组织上也进行了调整，按系级组成支部，我被分配为工学院支部，包括土木系、机械系、化工系等，领导我们支部的总支委员是游兆丙。他说总支意见是让我担任支



1948年5月30日，华北学联在民主广场举行反对美国扶持日本及纪念五卅大会（张祖道摄）

部书记，我当时明确表示，根据我的了解，艾知生同志无论是水平还是工作能力，担任支部书记比我更合适，建议总支考虑一下，结果总支同意我的建议，由艾知生任支部书记，我任支委。我联系土木系的党小组，组长杨良源，组员刘惠群、王庸勤，另一个支委是新发展入党的机械系的吕应中，由他联系机械系党小组，组员赵葆元、关靖华。工作的重点是开展系级活动，用多种方式团结更多的同学迎接解放。

在开展系级工作的同时，我们同房间的张廷琦和艾知生、我及刘景白商量，组织“自由人”读书会，出壁报，争取更多的中间同学参加，“自由人”出了几期壁报，有军事评论，有思想杂谈，有文艺小品等，很受欢迎。

在此期间，我受组织的布置，帮助几位同学去解放区，一位是土木系张友实，一位是电机系李传信，我的任务是：帮助制造假身份证，通知联络地点、接头人、联络口号等。同房间的张廷琦也去了解放区，改名张万锷，他和我对换了衣服，他要我的中式棉袍，化装成商人。

东北全境解放后，大军迅速进关，北平面临解放，地下党布置迎接解放的多项具体工作，如保护学校仪器设备，争取教授留下为新中国工作等。我们分头直接访问土木系的教授，他们都表示愿意留下为新中国贡献力量，只是校长梅贻琦还是去了台湾。

没有想到解放来得那么快，12月13日，远处传来阵阵炮声和机枪声，15日传来消息，解放军进驻海淀，清华园解放了。几天后，西校门贴出了解放军第十三兵团政治部主任刘道生的布告，要求军政民机关

一切人员严加保护学校及全体学生，维持学校秩序，从此，清华投入了人民的怀抱，开始了崭新的一页。

从清华解放到北平解放的一个多月中，大家一直处于兴奋状态，一方面各系级组织制作宣传标语，准备北平解放后进城宣传，一方面传看介绍解放区的书籍如《冀东行》等。不久部队文工团表演《白毛女》《赤叶河》等解放区的话剧、歌剧。地下党组织也进行调整，一是改变过去单线联系的做法，可以相互打通关系；二是南北系合并组织支部，我们和北系的党员温益友、葛琴林等一起成立土木系支委会。为了迎接北平解放，成立了清华大学迎接解

放服务队，共有 2000 多名学生和 200 多名教师在北平城区参加为期两周的宣传工作。

从 1946 年 10 月进入清华大学，到 1949 年 2 月我进城宣传，历时不到三年，可是，对我来说，终生难忘。2 月，参加在北大四院召开的党员大会后，王汉斌同志通知我，由于革命工作需要，不要回学校了，留下来参加革命工作，即被分配到市委学委大学部工作，这样就结束了我在清华园的生活。

（本文节选自储传亨学长的自传，由储学长夫人陈瑞美 2017 年 1 月提供，标题为编者所加。）

我的黄鹤楼传奇

○向欣然（1963 建筑）

设计黄鹤楼之前，我正处在人生的最低谷。后来被吸纳到重建黄鹤楼的设计队伍中来，也是出于偶然的原因，“客串”而已。但是随着设计工作的进展，我变被动为主动，实现了“反客为主”的华丽转身，历时 8 年，主持完成了黄鹤楼重建工程的总体规划和全套建筑设计，并配合施工直到黄鹤楼重建落成，被称为“黄鹤楼的总设计师”。

黄鹤楼的设计过程充满了戏剧性因素，富有传奇色彩，故值得记录在此供大家分享。

1978 年夏，“文革”的硝烟刚刚散去，武汉市就传来了好消息：毁于清朝末年（1884 年）的黄鹤楼又要启动重建了。

这已经是解放后第三次启动此项目工程：第一次是 1957 年，因武汉长江大桥的兴建占据了黄鹤楼故址，武汉市政府遂提出重建名楼的设想，建筑方案拟恢复清末同治黄鹤楼式样，此举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同意和支持，后因受“大跃进”运动的影响，筹建工作被迫下马；第二次是 1975 年，据说是为了纪念“毛主席 1927 年登临黄鹤楼故址 50 周年和 1957 年指示重建黄鹤楼 20 周年”，准备在 1977 年重建落成黄鹤楼。不料在设计后期有人爆料称：清末同治黄鹤楼是为庆祝曾国荃镇压太平天国有功而建，“政治上有问题”。于是筹建工作再次中断。